

## 论宋初的统治思想

宋初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是赵宋政权确立和巩固的重要时期，也是安史乱后中国历史由动乱重新走向大治的时期。在这个重要的时期内，封建统治者采取何种统治思想来指导重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呢？就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状况而言，几乎一致认为把黄老思想作为宋初在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并由此形成黄老之治的局面，以及导致宋初保守政风的形成。<sup>\*</sup>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与宋初政治思想的发展实际多有不合，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黄老思想在宋初政治上的作用。实际上，宋初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仍是儒家的政治思想。本文就这个问题，略陈管见不妥之处 敬请批评。

### 一、宋初黄老思想的发展及其 与汉初黄老思想之比较

黄老政治思想在宋初受到一定重视，这是事实。

但，统治者有黄老思想与统治者把黄老思想作为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是两个不能混淆的概念。自两晋南北朝以降，儒佛道三教互相排斥、互相吸收，迄唐宋之际逐渐融会贯通，实乃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因而唐宋之际的政治家或思想家，在信奉孔孟学说之外，又笃信佛道，并不足为奇，此乃当时的一大时代特征。所以说，宋初最高统治者有一些黄老思想，并不意味着黄老思想在宋初政治上就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事实上黄老思想也不是宋初的治国总纲领或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

首先，看一下黄老思想在宋初的发展。从现存史载和今人的论述来看，宋初黄老思想的流行主要是在太宗和真宗两朝。而太宗大力提倡黄老思想又集中在太宗晚年，亦即在距太宗去世仅五六年的淳化年间。<sup>①</sup>太宗之所以在晚年大力提倡黄老思想，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和心理因素。我们知道，太宗继位的问题是一千古之谜，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争论不休。不论太宗是弑兄篡位，还是合法继位，这里不妄作评论，但太宗为了确保皇位，数起大狱，采取了诸多非常手段却是事实。如“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sup>②</sup>对此，朝廷内外“远近腾口，咸以为非”<sup>③</sup>，以致于太宗对来自朝廷内部的“奸邪”可能危及皇位的“内患”耿耿于怀，深惧于心。<sup>④</sup>太宗又急于建功立业，想以收复燕云，借以提高自己的威望，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又导致两次北征契丹惨败。辽朝

军事上的强大使太宗欲有为而不能为，就是号为小蕃的党项族崛起于西部，虽几番调兵遣将剿杀，极想以武力使之俯首贴耳，但事与愿违，愈剿杀其势愈壮，太宗终无所获。军事上的一再失败，使太宗对建功立业心灰意冷，遂产生“厌兵”情绪。他曾对臣下说：“朕自即位以来，用师讨伐，盖救民于涂炭，若好张皇夸耀，穷极威武，则天下之民几乎磨灭矣。”朕每议新兵，皆不得已，古所谓王师如时雨，盖其义也。今亭障无事，但常修德以怀远，此则清静政治之道也。”<sup>⑤</sup>并多次引用老子的话“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显然由这些事实来看，太宗提倡黄老思想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自继位以来欲有所为而不能为的一种反动，其实质是为苟且偷安的对外政策张目。此与有的人认为太宗“以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为修身治国的总纲领”的观点相距甚远。

有论者以为真宗时期乃黄老思想甚为流行的时期，也是黄老思想对当时政治甚具影响的时期，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生性“聪明必多作为”的皇帝，在北宋九位君主中，是最好“兴作”的二位皇帝之一（另一位是宋徽宗）。真宗喜好兴作，系指大中祥符以后所搞的“天书封祀”闹剧。此闹剧从大中祥符元年导演天书下降之后，至乾兴元年真宗死去，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将天书殉葬为止，十五年间，东封泰山，西祀汾阴，营建玉清昭应宫，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宫观迭起。这场闹剧旷日持久，规模宏大，劳民伤财。据《宋史·食货志》载：“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阴，上宝册又增二十

万。大中祥符以前宋财政尚宽余，三司使丁谓说“大计固有余”然仅过了三年多时间，大中祥符四年丁谓则说“东封及汾阴，赏赐亿万”；“恐有司经费不给”<sup>⑥</sup>。再看营建玉清昭应宫“凡役工日三四万，发京东、西、河北、淮南州军禁军，调诸州工匠每季代之，兵卒岁一代，并优其口粮、资值”<sup>⑦</sup>；“宫凡三千六百一十楹”<sup>⑧</sup>。耗费国帑不可胜纪”<sup>⑨</sup>，至于“斋醮糜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sup>⑩</sup>越演越烈的宫廷奢靡之风，其耗费也是惊人的。这些活动所造成的直接的经济后果，就是“海内虚竭”。<sup>⑪</sup>显然，这场闹剧所表现出的大事兴作与黄老清静政治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也与汉初黄老之治大相径庭。<sup>⑫</sup>

再从时代背景看，论者以为以清静无为为特征的黄老政治思想特别适应大动乱后的统一政权，能够迅速将社会导向安定，西汉初年如此，宋初七十年亦如此。也就是说时代需要决定了宋初统治者对黄老思想的选择。若单就赵宋政权建立在晚唐五代大动乱之后，与汉朝建立在秦末大动乱之后的‘乱’的形势而言，两者有其相似之处，但宋初政治绝不是汉初政治的简单重复。换言之，汉初和宋初治‘乱’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

众所周知，秦王朝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它昙花一现，仅传及二世便在秦末农民战争的打击下灭亡了。汉高祖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他所著《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秦代‘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

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缓刑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地主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这样就形成汉初统治者的所谓“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汉高祖以及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各项措施，正是这种无为思想的体现。<sup>⑬</sup>但黄老思想总归只适合汉初休养生息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需要。黄老思想的反人文主义的实质，它的崇尚自然俭朴而反对文教、文化、生活享受和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思想终归是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背道而驰的。所以一当经济恢复，政治安定以后，吸收黄老和各家思想而又高于黄老和各家思想适应巩固大一统的封建政治需要的新儒术便很快取代了黄老的地位，而成为社会和政治的指导思想。

宋初政治虽是建立在大动乱之后，但它与汉初政治所要解决的问题却大不相同。其一，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瓦解，唐中央制约地方的政治经济权力被大大削弱。经安史之乱，形成藩镇跋扈，尾大不掉之势，五代则是这一势态的继续和发展。五代时期，王朝急遽更迭五十余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伦理纲常，特别是君臣一纲遭到严重破坏。加之，宋的建立未经过农民战争的冲击，所谓“受命之日，市不易肆”，<sup>⑭</sup>因而，重新确立和调整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对宋初统治者来说不如汉初那样紧迫。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

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分裂割据局面不再继续出现；二是如何使赵宋王朝长期巩固下去，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其二 宋建国之时 天下尚处在分裂割据状态“一榻之外 皆他人家也”，<sup>⑮</sup>因而实现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大一统政治目的，是宋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主要活动之一。

其三 五代总的来说 战争频仍 暴政迭出 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但中原地区自一代英主周世宗继位，采取了一些诸如奖励耕植 招抚流亡 平均赋役 限制寺院 减少浮食 崇本抑末 兴修水利 治理黄河 疏通漕路 发展工商 整顿钱币等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 其社会经济已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sup>⑯</sup>而南方在中原战争四起之时 多能保境发展经济 特别是荆楚、吴越、南唐和后蜀的经济取得较显著的进步。故当时太祖制定先南后北统一方略时，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南方殷实的财富。及太宗灭北汉基本上结束五代十国割据局面之时，宋的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 李心传说“国朝混一之初 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而两倍唐室矣”<sup>⑰</sup>这与汉初在经历了动乱之后的那种“自天子不能具钧駟 而将相或乘牛车 齐民无藏盖”<sup>⑱</sup>的窘境不可相提并论。

由这三点而论，汉初与宋初所处的时代背景在很多方面都有重大区别，因而宋初不可能重蹈汉初无为政治的旧辙。

## 二、从宋初经济政策看宋初的黄老思想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宋初经济政策如何，这是检验黄老思想在宋初是否居于主导地位的关键所在。有的论者以为黄老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与民休息、静以致治，因此在汉初得以盛行六十年，同样在宋初也得以盛行数十年。还有的论者认为，宋初数十年实行黄老无为政治的核心是与民休息，不过多地扰民，让农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讨论之前首先应澄清一个误解，即与民休息政策的理论依据是黄老的无为思想，其实这是一种不够全面的认识。因为在历史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不是只有在黄老无为思想下才得以实行，作为一种统治手段，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也是儒家民本、仁政、爱民思想的具体体现。历史上每一盛大王朝初期，出于巩固和稳定其统治需要，统治者都多少要实行一些减免租税，鼓励垦荒、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等与民休息的政策。如隋开皇之治、唐贞观之治、明洪武之治等，而这些“治世”的出现并不是在什么黄老思想指导下出现的。所以，与民休息的理论依据不可以黄老思想一言以蔽之。

毋庸讳言，宋太祖、太宗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实行过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它绝不能与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相提并论。其经济政策更谈不到“清静无为”和“不过

多地扰民”。

宋初加强中央集权，对维护和运转中央集权制的两个重要工具：军队和官僚尤下功夫。由于优待文武官僚和实行养兵政策，因而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步发展，官僚队伍和军员数便不断膨胀。譬如，军队总数从太祖初年 22 万人到真宗天禧年间增加到 90 余万人。<sup>⑬</sup>而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军队皆“仰天子之食”<sup>⑭</sup>。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宋初“克服天下在即位后”<sup>⑮</sup>，在长达二三十年的统一战争过程中，战争开支当是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太宗初即位，幸左藏库，视其储积，语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皇居常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薛居正等闻上言，皆喜。其后征晋阳，讨幽蓟，岁遣戍边，用度寝广，盐铁榷酤，关市矾茗之禁弥峻。太宗尝语近臣曰：‘俟天下无事，当尽蠲百姓租税。’终以多故，不果”。<sup>⑯</sup>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经济政策还能够反其“无所不为”而行“静以致治”“不过多地扰民”的无为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宋朝自建国开始，便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一面采取措施积极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一面以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且不说为了削夺地方藩镇的财权，以设置诸路转运使和以低级使臣、京官、选人充任各地监当官等手段“制其钱谷”，就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而言，宋初统治者也是“网利太密”与汉初“轻徭薄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sup>⑰</sup>，与民无禁”从民之欲而不扰乱……风流笃厚，禁罔疏阔”<sup>⑱</sup>形成鲜明对照。请看下面的事实。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仁宗明道二年十月壬戌条载：

自唐以来，民计田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所谓杂变之赋者也，亦谓之沿纳。而名品烦细，其类不一，官司岁附帐籍，并缘侵扰，民以为患。帝躬耕籍田，因诏三司沿纳物以类并合。于是，三司请悉除诸名品，并为一物，夏秋岁入，第分粗、细二色。<sup>②</sup>

可见，唐五代时期在征税之外，增添的不同名目的苛捐杂税，宋朝大都继承下来，谓之“杂变之赋”或“沿纳”。其征敛，某些方面比五代更为苛刻。“杂变之赋”的名品烦细，真宗时单是原南唐统治地区中就有 17 项，除农具税一度废除之外，有“盐博细绢、加耗丝锦、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盐博斛斗、酝酒曲钱、率分纸笔钱、析生望户钱、甲料丝、盐博锦、公用钱米、铺衬芦废、米面脚钱”<sup>③</sup>等。在其他地方还可看到买卖牛羊有税，买卖粮食也有税，买卖田宅有税（田契钱等），修房盖屋也要纳税（木税钱），牛活着有税，牛死了还纳税（牛皮钱），丁口多要承担重差，而析烟分居则出罚钱。至于蒿钱、鞋钱、脚钱、见钱等等之类，更是不一而足。<sup>④</sup>

在四川地区，宋灭蜀后，几年内把后蜀仓储财物全部运到京师。除向蜀地人民征收两税等“常赋”外，还在成都设置“博买务”，征调各州农民织作一些精美的丝织

品，禁止民间交易，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更加贫困。对于川峡盛产的茶叶 宋政府“ 掇取茶利 ”使川峡人民的生路几致断绝。这些都加速了当地阶级矛盾的急剧发展，到淳化四年二月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禁榷制度是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这种制度自汉武帝确立以降，为历代王朝所奉行。宋初不仅继承前代的禁榷制度，而且较前代扩大了。如宋代禁榷制度中的盐、茶、酒、矾都是前代继承下来 而香料、醋的禁榷则是前代所没有，为宋代创始的。宋代征榷的方法也比过去严格多了。如盐，建隆二年，宋太祖下诏“ 私炼者三斤死 擅货官盐人禁法地分者十斤死 以蚕盐贸易及入城市者二十斤已上杖脊二十，配役一年……”<sup>①</sup>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盐禁虽有所放宽，但自煎盐一两即决杖十五；二十斤至三十斤即予杖脊的同时还配役一年至一年半；一百斤以上 就要“ 刺面押赴阙 ”。<sup>②</sup>又如酒榷，太祖建隆二年四月诏：应百姓私造曲十五斤者死 酤酒入城市者 三斗死 不及者等第罪之。买者减卖人罪之半。<sup>③</sup>宋代榷茶始于太祖乾德二年，“ 令民折茶税外 悉官买 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驻鬻者 没入之。”并根据茶值多少定杖罪和流罪；主管官吏以官茶私自贸易者 五百文即流二千里 过一贯五百 以及持杖贩卖私茶而被官私擒捕，即处以死刑。<sup>④</sup>又如榷矾，开宝三年二月 先是禁商人私贩幽州矾 犯者没入之。其后定令，贩河东及幽州矾一两以上，私煮矾三斤，及盗官矾至十

斤者，弃市。<sup>③</sup>由这几个例证，可知宋代不仅把一切有利的商业经营权都收归政府垄断，而且是以严刑峻法来保证这种垄断。至于封建国家是如何通过禁榷制度来垄断干预商品经济的具体内容，现早有诸多论著论其详，<sup>④</sup>不需多言，这里只看一下田锡和王禹称的议论即可略见一斑。

太平兴国七年，田锡上太宗皇帝条奏事宜云：“莞榷货财，网利太密……网利太密者，酒曲之利，但要增盈，商税之利，但求出剩。或偶有出剩不询出剩之由 或有亏欠 必责亏欠之过 递年比扑只管增加，递月较量不管欠折。然国家兵数广支用处多，课利不得不如此征收，莞榷不得不如此比较。穷尽取材之路 莫甚于兹 疏通殖货之源 未闻适变……”<sup>⑤</sup>

至道三年五月，王禹称应诏上疏初继位的真宗“夫山泽之利与民共之 自汉以来 取为国用 不可弃也 然亦不可尽矣 方今可谓尽矣。何以知之 只如茶法从古无税 唐元和中 以用兵齐蔡 宰相王涯始建税茶之法，《唐史》称是岁得钱四十万贯 东师以济。今则钱数百万矣，民何以堪之。”<sup>⑥</sup>

面对上述事实，很难令人想像，奉黄老清静无为思想为治世圭臬的统治者，会制定出如此汲汲于财利的大有为的经济政策的。所以称宋初政治为黄老之治似与

其经济政策的实际内容不符。

### 三、宋初保守政风形成的社会原因

宋初政治自太宗朝起因循苟且，墨守成规的保守政风很浓厚。当时的宰相从赵普到李沆、王旦等，都以不生事为原则。《邵氏闻见录》载赵普于厅事坐屏后置二大瓮，“凡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于通衢。”宋琪“在相位日，百执事有所求请，多面折之”。<sup>②</sup>李沆“在位小心循谨，无赫赫称”，<sup>③</sup>贾黄中“及知政事，率无所建明，时论不之许”，<sup>④</sup>真宗时绰号“没口匏”的李沆“自言，居重位，实无补万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聊以此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清妄有更张，即所伤多矣”。<sup>⑤</sup>王旦“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sup>⑥</sup>吕端更是“利不百，不变法”。真宗本人“惟宜谨审”，先朝皆有成宪，但与卿等遵守”。<sup>⑦</sup>上层统治集团的这一政治倾向正如欧阳修所指出的“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然苟且，偷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sup>⑧</sup>

那么，宋初保守政风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说黄老无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宋初保守政风的蔓延，此与史实不悖。但若说宋初保守政风是太宗、真宗奉行黄老之术为治乱指导思想所导致的结果，即所谓数十年黄老之风的薰染，使因循守旧习成风气，日趋严重，则是流

于表面的认识。实际上，宋初保守政风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首先，宋初保守政风是其防弊之政发展的结果。邓广铭先生认为赵匡胤即位之后，出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针对晚唐以来皇权衰落的诸多弊端，故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诸方面的立法都贯穿着一个总的原则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sup>④</sup>太宗即位第二天所下的一道诏令中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仅当遵守，不敢逾越。”<sup>⑤</sup>此处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即是防弊之政的精神要旨。宋初把这一精神要旨贯彻到具体的施政方针中。

其具体做法概言之有二：一是相互制衡，分化事权，藉以削弱各个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员的权力，从而相对地扩大皇帝的权力。如以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军权和财权，用设置三衙与枢密院分掌兵权，又如分地方长吏之权的通判，常以监郡自居，声称“我是监军，朝廷使我监汝”<sup>⑥</sup>。由于事权的分割和官僚机构或官员间的互相牵制，各项事物即使事关整个国家的重大事务，亦不能步调一致，得到应有的处理。如仁宗时，范镇上疏指出军、政、财各不相知的弊端：“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sup>⑦</sup>分化事权的必然结果是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的

建立。像尚书省各部“吏部闲了，事却归审官院及流内铨；户部闲了，事却归三司；礼部闲了，事却归礼仪院；刑部闲了，事却归审刑院；兵部闲了，事却归枢密院”<sup>⑭</sup>，九寺五监亦都是无甚职掌的冗散机构。但在这些冗滥机构中“事却依旧公事”<sup>⑮</sup>；人即加倍添人”。<sup>⑯</sup>为冗官的增加创造了条件，也为保守主义铺平了道路。

二是将‘以矫失为得’的防范措施‘悉为之法’而且日趋严密，以致于“摇手举足，辙有法禁”。杨万里曾举过一个典型的事例：“太祖皇帝尝令后苑造一薰笼，数日不至，帝怒，责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寺，本寺下本局，覆奏又得旨依方下制造，乃进御，以经历诸处故也。帝怒问宰相赵普（普）曰：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好。”<sup>⑰</sup>太平兴国八年十月，太宗对宰臣说：“近者内外政事物，渐成条贯，远近官吏，无不畏谨，朕思之不觉自喜。”<sup>⑱</sup>宋统治者这种‘禁防纤悉’‘悉为之法’的结果，虽然达到了“政出于一”<sup>⑲</sup>“权归于上”<sup>⑳</sup>；威柄最为不分’<sup>㉑</sup>的目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愈益成为培植政治庸人的极好土壤。景祐年间，吕夷简在中书“奏令参知政事宋绶编次中书总例，谓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执之，皆可以为相矣。’”<sup>㉒</sup>此正是庸人政治的真实写照。在“摇手举足，辙有法禁”的束缚中，百官不过“奉法遵

职”，<sup>⑤</sup>维持现状而已，他们不知道通融变革“因循懦弱为得计，志士仁人终无以为”<sup>⑥</sup>。

其次，循资转官的磨勘制度为宋初的保守政风推波助澜。“国之致治在于审官”，<sup>⑦</sup>宋初以“循名责实”为指导思想，着手整顿吏治，尤注重百官的考课。宋太宗时曾设立京朝官、幕职州县官磨勘院，负责考课黜陟官员，后又改为审官院、考课院。磨勘院的名称虽改，但磨勘百官之实却未变，太宗晚年考课制度日益程式化、公文化，及至真宗继位便正式产生了磨勘法。磨勘制度形成后囊括了对官吏考绩、资格的全部检覆工作，并与转官结下不解之缘，逐渐变成晋升官秩的主要途径。这一制度是适应宋代统治者防范攀援朋比，加强集权的政治需要而产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的弊端愈来愈明显，“资历至上”的原则使各级官员“居官三周、例迁一级”，<sup>⑧</sup>成为保守主义发展的温床。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十大纲领中首议“明黜陟”对真宗以来的磨勘制度抨击曰：

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此岂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而有所为也，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所为也。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

陛下兴公家之利 救生民之病 去政事之弊 葺纲纪之坏哉！<sup>①7</sup>

由此可见 这个奉“资历至上”为原则的制度“对于造成宋代吏治之因循保守，显得奄奄无生气，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sup>①8</sup>。

其三，上层集团所表现出的“率由旧章”的保守政风，实质上是在维护豪强兼并和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宋初奉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本朝不抑兼并 曰‘富室连我阡陌 为国守财 缓急盗贼窃发’ 边境扰动 兼并之财 乐于输纳 皆我之物”。<sup>①9</sup>正是在这个温床上，兼并势力便日益严重地滋长起来。宋初文武官僚无不广占田产 而且这些田产都是“便好田宅” 择肥而噬” 至仁宗即位之年，品官形势之家占田达“天下田畴”之半。<sup>②0</sup>各地豪强、富商大贾也是兼并土地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肆意兼并，拥有无数的“田畴邸第”。<sup>②1</sup>土地兼并发展的结果 使由各地品官、富豪、形势户组成的大地主阶层日益地强壮雄厚起来。如果按《文献通考》所说十分之六七的田亩都被豪强地主隐蔽下来，而不纳田赋来推算，至少百分之六七的土地集中到这个阶层来了。在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趋于崩溃，地主土地所有制占居首要地位的时代里，经济力量如此雄厚的大地主阶层，其社会地位自然会得到相应的提高。随着大地主阶层经济力量的强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赵宋封建政权愈来愈甚地成为维护这个阶层利益的工具。

从赵宋建立之初 在其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当中 就赋于这个阶层许多政治特权。如官户享有免除差役及夫役的特权，赋税和名目繁多的摊派课敛都在这样和那样名义之下大部以至全部免除。还有宋代的各级官员享有根据自己官职的高低而授给其子弟或亲属以官衔、差遣的特权，即所谓的恩荫。自景德、祥符年“每遇南郊”或“逐年圣节”即许可官阶较高的文武官员“奏荫子孙弟侄”尤其是“臣僚之家用及皇亲母后外族 皆奏荐，略无定数 多至一二十人 少不下五七人 不限才愚 尽居禄位 未离襁褓 已列缙绅”<sup>②</sup>。显然，豪强兼并和品官特权阶层是宋初政治经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因而他们支持宋封建专制政权。在现状不加任何变更的条件下，他们不仅可以保持而且可以进一步地扩大自己的利益。他们的政治要求和愿望便是维持现状，只要对自己稍有不利，任何的改作和变更，就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的命运，不都是因为变革触动了这个阶层的既得利益（如范仲淹提出的“明黜陟”、“抑侥幸”王安石提出的“摧抑兼并”等改革主张）而遭到他们的重重非难和严酷打击后走向失败的吗？所以说“率由旧章”的保守政风实质上是上层集团为维护其特权和既得利益，在政治上要求保持现状的一种反映。

#### 四、宋初对儒佛道的政策

以上仅就黄老思想是宋初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统